**凯文·E·弗雷德里克博士，《瓦尔多派》，第 4 讲，
《根本区别》，《贫穷的作用》** © 2024 Kevin Frederick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四节，激进的区别，贫穷的作用。

讲道的题目是激进的区别，我为这节讲道选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 4:32 至 37。

现在，所有信主的人都同心同德。没有人声称拥有任何财产，而是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共同拥有的。使徒们以极大的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作证。

他们全都蒙了大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是卖了田产房屋的人，都把卖了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上，分给各人所需用的。

有一个利未人，名叫约瑟，是塞浦路斯人，使徒们给他取名为巴拿巴，意思是鼓励之子。他卖掉了自己的一块田地，然后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边。这是主的话。

感谢上帝。在基督教运动的最初几十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一小群信徒开始按照耶稣的教诲生活，提倡一种以分享所有财产和资源以及相互谦卑精神为特征的集体生活方式。《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作者报道说，那些拥有土地和房屋的基督信徒卖掉了他们的财产和资产，并将他们的资源提供给使徒，使徒们将他们的资源分发给穷人，这样他们的信仰社区中就没有人需要帮助了。

早期教会的这种集体反应被认为是忠实地履行了基督徒的号召，当时信仰团体期待着主的即将归来。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几十年过去了，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仍未发生，基督教信仰团体对共享资源和集体生活的这一原则的狂热遵守逐渐减弱。到了 11 世纪，教会内部的标准做法已经使其变得腐败和领导不力。

教会官员的权威受到广泛质疑，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在广大民众中。在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统治期间（1073 年至 1085 年），这些做法受到了严格审查，导致了一项名为格里高利改革的教会改革体系。受到质疑的是任命教会领导的两种主要做法，包括世俗领袖任命领袖的世俗授职权，以及买卖教职的做法。

买卖圣职也是教会用来将土地授予向教会支付土地使用费的封臣的一种做法。世俗授职和买卖圣职都导致教会等级制度的道德衰落。其无效性影响到每一个层面，导致中世纪社会其他人对教会领导层的不信任感日益增加。

根据约翰福音第 10 章中对教会领袖作为牧羊人的描述，教皇在格里高利改革中禁止了俗人授职和买卖圣职。为了确保教会任命的职位纯洁，格里高利改革要求所有教会领袖保持独身。作为确保神职人员责任制的一种手段，教皇格里高利鼓励俗人公开批评牧师和主教的不道德行为。

由此产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即圣职人员或圣职人员所执行的所有圣礼都是无效的，并且必须重新任命这些神职人员。教皇格里高利鼓励批评不道德的教会领袖的合法性，这种做法后来又困扰了罗马教会，并削弱了其在后世世俗世界眼中的权威。到 13 世纪初，许多瓦尔多的追随者拒绝接受那些被证明道德有问题的牧师和主教提供的圣礼。

这种做法被称为多纳提主义。格里高利改革引发了对罗马教会的批判，这种批判在整个公元 12 世纪都势不可挡。越来越多的罗马天主教会培养的圣经学者也开始从圣经和伦理的角度质疑教会积累财富和财产的做法。天主教会高层采取的奢侈生活方式尤其受到谴责，这与绝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形成了鲜明对比。

那些以主的名义服务的教会领袖，他们自己也为人类受苦和牺牲，但他们的财富和贪婪却远离了耶稣基督的教义和教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苦难。在 12 世纪初期，彼得·阿伯拉尔就是这样一位天主教学者，他开始在教会的学术辩论圈内提出这些问题。基于对教会财富积累和其领袖贪婪生活的批评，正如阿伯拉尔和其他圣经学者所阐述的那样，瓦尔登斯运动开始强调社区生活。

在它存在的第二个十年里，贫穷的莱昂和他们的传教旅行者遇到了另一个异常的基督教团体，被称为伦巴第穷人，该团体注重社区生活和对俗人的教育。如前所述，天主教等级制度是 12 世纪欧洲最富有的等级制度之一。积累个人财富往往会促使教会领袖纵容许多罪恶，包括性不道德、酗酒和对社会上许多人的苦难漠不关心。

因此，整个 12 世纪，西欧出现了许多反对教会领袖淫秽和不道德行为的运动。这些反对运动包括彼得罗布西亚派、亨利金派、屈辱派、阿诺尔派和卡特里派。一般来说，这些反对运动都发誓要过贫穷的生活，并以耶稣基督的教义和生活方式为榜样。

在这些团体中，阿诺尔德派于 13 世纪兴起，由瓦尔多和莱昂穷人组成。阿诺尔德派是罗马天主教学者兼僧侣阿诺德的追随者，阿诺德来自布雷西亚，布雷西亚是意大利北部米兰附近的一个伦巴第小社区。阿诺德出生于 1090 年，曾是伟大学者彼得·阿伯拉尔的学生。

和阿伯拉尔一样，阿诺德也批评罗马教会的财富积累以及主教和牧师的放荡不道德行为。然而，与阿伯拉尔不同，阿诺德并不满足于仅仅以学术的方式讨论神学信仰。作为一个行动派，他不仅在心中，也在脑海中感受到真理，并且实践并希望其他人也实践一种由基督的纯洁、净化、民主精神主导的生活。

阿诺德与阿伯拉尔决裂，于 1130 年代初返回布雷西亚，在伦巴第各城镇地区传播他的信息 20 多年。他以耶稣的教义为中心传达统一的信息，尤其是在马太福音 25:31 至 46 中，耶稣在其中劝诫他的追随者要给穷人食物，给赤身裸体的人衣服，探望病人。他还在使徒行传 2:44 至 47 和使徒行传 4:32 至 37 中强调了基督教社区生活的本质，其中描述了基督教社区致力于在整个社区之间分享资源。

阿诺德宣扬了共享资源、照顾最弱小的兄弟姐妹等信息，以及《使徒行传》中揭示的其他道德改革。与罗马天主教会使用拉丁文圣经译本武加大译本相反，阿诺德用白话文向他的信徒传达福音信息。阿诺德的布道对罗马教会及其坚持使用武加大译本作为唯一经教会认可的圣经译本构成了巨大威胁。

由于阿诺德公开批评教会的财富积累，以及教会高层的奢华作风，他强烈要求教会将教会土地移交给城邦。用他的话来说，拥有财产的神职人员、持有王室徽章和土地赠与的主教以及拥有财产的僧侣不可能得救。这些挑战对罗马天主教会构成了巨大威胁。

因此，阿诺德被谴责为异端者，是教会的敌人，并于 1155 年在罗马被烧死，这距离瓦尔多开始传教已有近 20 年。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但他的教义和追随他的社区在伦巴第地区仍然存在。阿诺德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基督教社区，尽管规模很小，三十年后，瓦尔多的巡回旅行将他带到了伦巴第地区，这些社区仍在运作。

1184 年之前，巴尔德斯为教会等级制度所提出的问题是牧养问题，是传教士贫困的强烈呼吁与制度化神职人员的仪式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巴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要求将他们的热情服从于一个等级制度的管辖，而这个等级制度并不认同他们对使徒贫困的强烈渴望和他们重生的使命感。巴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拒绝服从教皇的法令，因此对教会的权威构成了无可遏制的威胁。

因此，1184 年，瓦尔多被打上叛教者的烙印，被逐出里昂。瓦尔多的追随者们因此采纳了福音座右铭，即成对被派出去传教和教导福音。瓦尔多和他的追随者们作为传教伙伴前往东方。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这是他们在伦巴第地区建立的联系的一部分。伦巴第的穷人以《使徒行传》第 4 章和第 5 章中出现的早期基督教社区以及雅各书和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阐述的传道实例为基础建立了他们的组织。伦巴第的穷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而这在瓦尔多运动中是没有的。

里昂穷人和伦巴第穷人的共同点是他们致力于过贫困的生活，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到 1205 年，这两个群体已经相互联系，但在关注点上仍然截然不同。瓦尔多坚持单方面专注于传教和接受听众的施舍作为维持生计的唯一手段，而伦巴第的穷人则坚持每个成年人都为社区中每个人的福利而努力。

因此，劳动力问题成为两派之间的主要争论点。伦巴第的穷人都发展了自己的行业和技能，为社区的福祉贡献自己的才华。在后来的几代中，当宗教裁判所迫使瓦尔多派传教士们采取秘密行动以求生存时，拥有一门可行的行业对瓦尔多派传教士大有裨益。

在里昂贫民运动存在的最初几十年里，一位精通拉丁语的罗马天主教学者加入了里昂贫民运动，并为该运动提供了所需的思想完整性和深厚的神学基础。这位学者的名字是韦斯卡的杜兰德。他最大的贡献是撰写了一份手稿，旨在指导里昂贫民运动及其反对法国南部异端卡特里派的传教工作。

卡特里派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分支，他们信奉对上帝本质的二元论解释。他们认为，《旧约》中的上帝是邪恶的，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本质上都是邪恶的。相比之下，卡特里派则认为《新约》中的上帝是善良的。

卡特里派宣扬耶稣不可能是一个有形的人，因为所有有形的人本质上都是邪恶的。相反，他们相信耶稣是一个精神存在，实际上不会遭受痛苦。这种错误信仰体系的影响将在一篇名为《反异端之书》的论文中的另一篇布道中讨论。

杜兰德在《反异端书》中为里昂的穷人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神学大纲和一套指导方针，以有效地对抗卡特里派的错误信仰，并让民众重新回归母教会。《反异端书》是杜兰德对瓦尔登派运动的最大贡献，为该运动提供了坚实的神学重点。这份文件甚至受到许多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主教的赞赏，被认为是教会对抗卡特里派异端的有效工具。

1206-1207 年，瓦尔多去世后，韦斯卡的杜兰德开始付出巨大的个人努力，试图让瓦尔多的追随者与罗马天主教会重新统一起来。然而，他让瓦尔多派运动与天主教会重新统一起来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由于瓦尔多的追随者坚持公开用白话传教，罗马天主教会拒绝承认平信徒用白话传教和使用圣经译本的权利，并将瓦尔多的所有追随者逐出教会。

韦斯卡的杜兰德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比瓦尔多的追随者更为温和，因此他们愿意与罗马妥协。杜兰德认为与母教会的团结比传教权更有价值。他和他的一群盟友于 1208 年重新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杜兰德曾短暂地相信，里昂的穷人和罗马天主教徒可以重新团结起来。但在试图充当两者之间的统一桥梁失败后，杜兰德主张在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发起一场名为“贫穷天主教徒”的新运动。1208 年，教皇批准成立贫穷天主教徒，以此将平信徒的声望和势头转向贫穷誓言，远离瓦尔多的追随者，回归罗马教会。

在罗马教会批准贫穷天主教徒成立后的几年内，一位名叫阿西西的弗朗西斯的年轻皈依者放弃了他的家庭财富，并通过发誓贫穷来寻求履行教会内的使命。教会高层将阿西西的弗朗西斯视为可靠的资源，通过他可以将贫穷天主教徒组织背后的原则融入更大的教会。因此，教皇选择在阿西西的弗朗西斯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新的修道会。

方济各会成立于 1212 年，通过采纳沃尔多和阿诺德派发展的许多相同原则，在其团体内推崇贫穷、谦卑和仆人生活。与伦巴第贫民会一样，方济各会强调通过采用效仿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来教育其追随者的重要性。如果认为阿西西的方济各和方济各会运动直接效仿沃尔多和里昂贫民会，那将是历史误导。

弗朗西斯的重点主要来自他自己对经文的探索，但弗朗西斯在托斯卡纳长大，瓦尔多运动的信息和影响在那里得到广泛传播。这一事实，加上杜兰德返回母教会并在罗马教会内建立贫穷天主教徒，为以耶稣的苦难人性和贫穷为模型的认可教会秩序原则在罗马教会内扎根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尽管如此，教会仍然拒绝完全采用里昂贫穷教会的平信徒主导的福音传教重点。

有证据表明，如果不是里昂穷人会在其存在的前 30 年里广受欢迎且迅速传播的福音传教活动，教会可能不会创建方济各会。正是因为里昂穷人会和伦巴第穷人会（罗马天主教宗教裁判所贬义地称他们为瓦尔多派）在神学上与罗马天主教会的许多核心信仰密切相关，他们的福音传教活动对公众的影响远大于任何当代宗教运动。他们基督教信仰信息的广泛影响成为罗马天主教试图消灭瓦尔多追随者的主要原因。

一位匿名但见多识广的宗教审判官在 1260 年代首次撰写的一篇论文中声称，瓦尔多派是教会面临的所有异端团体中最危险的。这一声明得到了教会高层的认可，其原因有多种，包括该信息被广泛接受、教会领袖聚敛财富受到批评、里昂穷人信奉罗马教会的每一项神学信仰——最后，他们用民间语言而非拉丁语进行简单的布道非常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瓦尔多在里昂发起运动后的 50 年内，罗马天主教会响应瓦尔多在公共场合宣讲上帝之道的号召，创建了自己的官方组织，即致力于宣讲圣言的多米尼加人，称为 Ordo Praedicatorum。如前所述，第二个重点是创建致力于宣扬贫穷的方济各会。但是，13 世纪早期的天主教会和瓦尔多派在处理这两个基本事工要素时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最初，天主教会将宗教重点放在宣讲和贫穷上，最初由多米尼加人和本笃会以白话宣讲上帝之道，而方济各会则采用宗教重点放在宣讲贫穷上。必须承认，瓦尔多派是第一个将这两个要素整合并体现在领导模式中的有组织的基督教事工。这种分离的区别使罗马天主教会得以保护其财富，不受挑战，由于未能认识到对财富和财产的盲目忠诚给罗马教会的基督教见证带来的威胁，削弱了福音信息的完整性。

正是贫穷的基督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过着巡回传教和贫穷的综合生活，这种日益增长的受欢迎程度让教皇无法再忽视，这促使教会建立了一套天主教修会，将贫穷和传教融为一体。1220 年代，随着教皇组织了传教团，天主教传教修会的建立授权方济各会、本笃会和道明会成员发誓贫穷，用人民的语言传教。然而，绝大多数牧师和主教并不忠于这些神圣的修会，也不受其约束。

又过了 300 年，才出现一种对基督教领袖的正直信息和生活方式的综合强调，这种强调超越了这三个天主教教派和西欧瓦尔多派运动的有限影响。直到 16 世纪初马丁·路德和新教改革才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基督的贫穷和谦卑的关注的起源可以在这个时代产生的基督教艺术中直观地追溯到。

13 世纪之前，罗马天主教会就耶稣基督的本质所传达的基督论主要强调的是全能者，即复活的基督是宇宙之主。基督作为全能者以金色和白色为主色调，传达了复活之主的强大和胜利，是基督普世统治的形象。随着 13 世纪社会和教会对教会财富和权力的挑战，这种强调基督是所有国家和万物之主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 13 世纪中叶罗马教会方济各会运动的成长和兴起，方济各会将耶稣的人性和苦难带到了天主教会视觉艺术的前沿。因此，从那时起，罗马天主教会许多致力于耶稣基督主题的艺术诠释开始强调耶稣的人性和苦难本质。对十字架的强调，即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形象，是方济各会运动对罗马天主教的重大贡献。

在这个时代，对耶稣人性的关注也影响了教会对集体崇拜的重视，并在创建致力于天主教基督论的礼拜资源和神学文献中得到了发展。纵观历史，来自基督教信仰内部和外部的教会批评者都为将焦点转移到信仰的基本要素上做出了很大努力。瓦尔多、阿诺德和阿西西的弗朗西斯都帮助维护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神学重点，向教会发起了挑战。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阿门。

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四节，激进的区别，贫穷的作用。